

关于献陵陪葬园区布局的思考

张 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 唐献陵 陪葬墓 陵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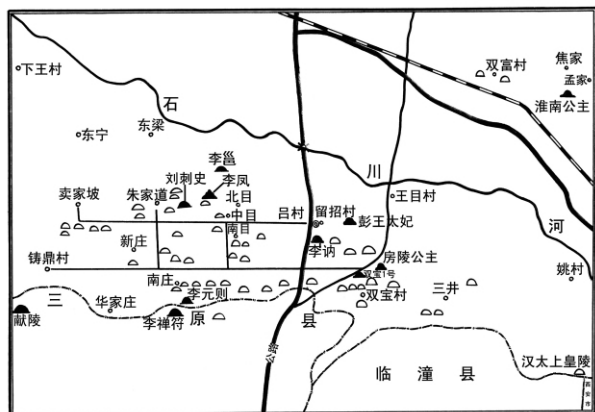
摘要: 唐高祖献陵位于陕西三原县, 但陪葬墓区却分布于其身后东北方的富平县境内, 本文从考古资料入手, 结合文献记载, 就唐高祖献陵陵园选址、陵园布局、陪葬墓位置等方面与秦汉帝陵相对照, 阐述了献陵的主要特点、陵区布局及陵制承袭脉络, 并附上富平县文管会陵区调查所得陪葬墓分布草图。

KEY WORDS: Xian Mausoleum of the Tang Dynasty Peizangmu (attendant tombs) Mausoleum

ABSTRACT: 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Gao is located in Sanyuan County. Yet, the cemetery of attendant tombs lies in the Fuping county northeast of the Mausoleum.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juxtapose archaeological data, historical texts,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upon Qin and Han mausoleums, to discuss two issues: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Xian Mausoleum regarding its locality and layout and 2)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Mausoleums. In addition, a distributional map of attendant tombs identified through a survey by the Fuping County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will be attached to this article.

唐献陵位于陕西省三原县与富平县相交处, 主陵位居三原, 其北与东面属主要陪葬区, 隶属富平县管辖(图一)。李凤墓与李邕墓位于主陵东北侧, 房龄大长公主墓、淮南大长公主墓、1号陪葬墓则在主陵东侧。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 帝陵在陵园选址布局上多承袭秦制, 以土层深厚、土质坚硬的台原地形构造为主, 平地起冢, 封土呈覆斗状。经考古调查勘探, 西汉帝陵在秦帝陵陵园布局基础上有所修改, 使之更加独立化、规模化和设施完备化。陪葬园区布置按方位分别划分为若干区域, 埋葬不同类型随葬物品, 总称为从葬坑。陪葬墓区置陵东、北两侧, 陵东属主要陪葬区, 绝大部分皇族宗亲、高官名臣赐葬于此。陵北陪葬墓甚少, 葬于此者或许身份特殊。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为防盗掘, 魏文帝曹丕以仿古人无封无树为由, 撤除陵上封土、碑刻、建筑等传统帝陵建制。这一举措对魏晋帝陵制度影响重大, 导致该时期未出现类似西汉时期的大型帝王陵墓和规模宏大的陪葬园区。西晋灭亡后, 北方地区分割为十六国, 皆属西北少数民族政权, 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文化内涵均落后于中原地区, 其统治造成了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停滞和倒退, 因此皇室无力营建大规模陵寝, 在丧葬领

域中更多地继承了本民族风俗习惯, 不起封土、不留标志。所以这一时期陵墓至今尚未发现。公元386年, 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 建立了北魏政权, 接收和汲取了汉文化, 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使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与发展, 陵寝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高大的封土与部分陵前建筑得到恢复。迁都洛阳后, 帝陵位置明确、布局规整, 陵东设大规模陪葬墓区, 带有明显汉化特征。西魏政权建立于公元535~556年, 文帝元宝炬永陵在陕西富平留固乡。现今, 覆斗形封土仍保存完整, 陵前设石刻, 并有回廊、房屋等建筑遗迹。陵东约30米处有一高大覆斗形封土, 据县志记载, 乃永陵唯一陪葬墓, 墓主是文皇帝之妹。就其所处位置而言, 应承袭陪葬墓在主陵之东的汉代礼制。南朝是继东晋之后与北朝相峙的南方政权, 也是汉人政权的承袭。其社会经济超过北朝, 陵寝制度表现为: 帝陵依山而建、规模较大、布局规整, 但迄今发表资料中仅明确帝陵周边有陪葬宗亲与人臣墓葬, 尚未见到陪葬墓具体位置与区域划分的进一步说法, 故陪葬墓位置不详。总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帝王陵制的研究方面, 因受资料限制, 可提供的研究空间尚显不足, 与秦汉帝陵研究相比, 其陵区布局、结构、组成还不能明确



图一 唐献陵陪葬墓分布图

认定。所以陪葬墓区的存在、位置亦属置疑。

唐献陵为唐代开国皇帝高祖李渊陵寝,选址、结构、陵区布局划分与此后各唐陵差异明显。首先,在选址方面采取了平地营造覆斗形封土的传统做法,完全不同于太宗以山为陵的新葬制,这表明:献陵的营造理念仍继承和保留了较多的秦汉以来帝王陵制观念,是古制的延续。此后,唐代帝陵在选址、布局方面发生重大变革,依山而建成为太宗之后唐历代君主陵寝之定则。

其次,秦汉以来陪葬墓主要分布于主陵东侧与北侧,南北朝时期虽资料甚少,但通过北魏北邙山陵区布局及西魏永陵陵区布局可推断,陪葬墓分布仍在帝陵东侧,故该时期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秦汉帝陵陪葬制度仍被沿用。建于唐代的献陵陵区内陪葬墓群全部居于帝陵东侧与北侧,规划整齐、排列有序,并严格按身份等级设立覆斗式或圆堆式封土,其规划、方位、区域与汉制相符。自昭陵始,因帝陵依山而建,受地形影响,陪葬墓群很难从古制按方位整齐规划,故后代诸唐陵陪葬墓均无献陵陪葬墓群的等距离分布和陪葬墓区的规矩统一。所以,唐献陵陵区的布局再次表现了该陵在设计理念上效仿汉制与后世不同。

第三,做为帝陵的陪葬人群,自秦汉至唐代,八百多年来亦于悄然间发生变化,秦始皇陵东侧发现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推测为始皇帝宗亲大臣陪葬墓。汉代各陵陪葬墓包括皇室宗亲与功臣、名将、崇臣两大部分,数量上后者更胜一筹。唐献陵东、北两侧据《唐会要》^[1]载,共设陪葬墓26座,实际数量远不止此,唐太宗贞观

八年诏“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如有薨亡。宜赐莹地一所。十一年十月二日。又诏曰。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2]该段诏令中太宗明示,陪葬之举源于周、汉。高宗永徽六年又有诏曰。“其祖父先陪献陵。子孙欲随葬。亦宜听许。”^[3]所以,现存封土塚约40余座,出土墓志与考古发掘皆证实,陪葬人群仍与秦、汉选定标准一致,且以人臣为数居多。唐乾陵是唐陵寝制度完善确定的先驱,自此陪葬者身份以皇室宗亲为主,所以乾陵之后大规模陪葬墓区基本不见,中、晚唐帝陵陪葬制度衰败,陪葬墓多则数座,少则完全消失。

因此,在陪葬制度上献陵仍是汉制的延续与效仿。目前,献陵陪葬区的全面调查勘探工作正在进行,陵区范围广大,基本呈东西向窄长方形(图一)^[4],献陵位居陪葬墓区西南角隅之前列,身后率众多规划整齐的墓葬冢群,发掘资料显示,各墓冢之间又因身份等级差异而存在着陪葬与祔葬两种不同的性质。陪葬是陵主子女与生前近臣所有的特殊荣宠,祔葬者身份属陪葬人之妻妾子孙,以他们自身级别绝无资格进入帝陵陪葬区,仅凭借祖、父辈或夫君身份入葬,目的只求随葬先人之莹。嗣虢王李邕墓志云,斯为祖父李凤祔葬墓^[5],其妻扶余王妃则祔葬于李邕^[6]。由此推测,献陵陪葬区内可能划分许多陪葬墓园,至少封王者均附有相对独立的家族墓园,以备家人子嗣祔葬所用,各园区间也许设立围沟或以松柏树木为界。富平县志记载,献陵区域内林木繁茂,各墓园间是否以此为屏障,围沟之说是否成立,现只能从献陵勘探中得以证实。

唐献陵陵区内陪葬墓排列规律目前因资料欠缺尚不能确定,但献陵东与其并列的两座墓中有李渊从父子李神符墓(现墓碑尤残存);其后自西向东第一排有李渊十二子元则墓(自盗洞中见其墓志)、约第五排为李渊十五子李凤墓^[7];约第三排有房陵公主墓^[8];最北一排(跨过石川河)东北角有淮南大长公主墓^[9]。由此分析,献陵陪葬墓布局原则首先以辈份划分,李渊率同辈从兄弟居前排,众子、女、近臣等陪葬于陵后东北方广大区域内,子女中子之墓园似集中于北部而女之墓葬则多建于东与东北部较远处,故亲疏关系、等级高低、卒年先后是决定与主陵距离的重

要因素。嫔妃陪葬墓至今未见,所以位置尚不明确。汉制帝陵为平地起冢,内、外陵园间葬皇后与嫔妃,左侧居上。皇后陵位于帝陵左偏后方,即东北方,带有专属内陵园;其他高等级嫔妃多陪葬于帝陵之后,即北方。人臣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帝陵外陵园东司马门外。概括而言,陪葬墓区位居帝陵东北方,汉景帝阳陵与汉武帝茂陵皆遵循该基本原则。唐昭陵依山而建,陪葬墓群分布于陵东及东南方,昭陵陪葬墓总计200余座,知其姓名者50多座,由此可大致了解陵区内陪葬墓主身份等级划分为:高等级嫔妃与部分特殊身份公主就近陪葬于帝陵以东,大臣和其余子女则排列于较远的东南方。与献陵相同,辈份、亲疏、等级关系是决定与帝陵之距离的重要标准。此后,山陵成为历代唐帝陵的准则,乾陵继昭陵之后将帝王陵寝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所有陪葬墓皆置于陵之东南方,与帝陵的距离排列仍秉承前制。

通过对汉、唐帝陵及陪葬区域的研究对比显

示,唐献陵在陵寝选址、封土形制、陵区规划、陪葬墓区位置、陪葬墓布局等方面更接近于汉陵制度而与其它唐陵差别甚大。故曰:初唐帝陵建制理念仍与汉一脉相承,唐陵模式首创于昭陵而完善确定于乾陵。

- [1] 唐会要:陪葬名位·昭陵陪葬名氏(第2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同[1].
- [3] 同[1].
- [4] 该图为富平县文管会王保东等同志实地考察所得。
- [5] 张蕴.唐嗣虢王李邕墓志考[C]//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17-429.
- [6] 张蕴,汪幼军.唐故虢王妃扶余氏墓志考[C]//碑林集刊(第十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95-104.
- [7] 富平县文化馆等.唐李凤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7(5).
- [8] 房陵大长公主墓发掘简报[J].文博,1990(1).
- [9] 淮南大长公主墓2002年发掘,资料未发表.

(责任编辑 朱艳玲)

(上接77页)

- 唐大历四年(769)《大证禅师(昙真)碑》、唐大历七年(772)《镜智禅师碑》、唐元和元年(806)《慧坚禅师碑》、唐元和五年(810)《唐光宅寺故□□和尚道广茶毗遗记》、唐元和元年(806)或十三年(818)《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阴文》、唐元和十四年(819)《曹溪六祖大鉴禅师(慧能)第二碑》、唐大中九年(855)《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唐大中十三年(859)《尼广惠塔铭》、九世纪《传法堂碑》等。
- [12] 王鑒.十二硯齋金石过眼录(第10卷)[C]//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2:9.
- [13] 同[8]:101.
- [14] 同[8]:18.
- [15] 胡适.楞伽宗考[C]//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99.
- [16] 道宣.续高僧传(第16卷)[C]//历代高僧传.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7] 同[16](第26卷).
- [18] 同[16](第25卷).
- [19] 同[16](第11卷).
- [20] 同[15]:114.
- [21]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M].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286.
- [22] 智炬.宝林传(第8卷)[C]//释范成辑.宋藏遗珍(第四函).上海: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1935.
- [23] 普济.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8.
- [24] 胡适.跋宝林传残本七卷[C]//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178.
- [25] 同[24]:179.
- [26] 同[24]:178.
- [27] a.宝林传(第8卷)[M].b.陈尚君.全唐文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2278.
- [28] 董诰.全唐文(第44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4486.
- [29] 独孤及.毗陵集(第9卷)[M].上海:上海涵芬楼影印亦有生斋校刊本,7,10,11.
- [30] 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第2卷)[C]//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2:12.
- [31] 姚铉.唐文粹(第63卷)[C]//四部丛刊影印本.
- [32] 张强.包佶诗文集补辨[J].中南大学学报,2008(2).

(责任编辑 朱艳玲)